拜登强推对华投资限令 美企面临“混乱与恐惧”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拜登政府祭出‘史无前例’的行政令限制对华科技投资后，不少美国投资者面临‘混乱与恐惧’。”英国路透社8月14日报道称，美国新投资限制令虽然范围有限，但为境外资本管制设定了一个新框架，使今后扩大管制领域变得更加容易，这可能导致更多对华限制，进一步刺激中美紧张情绪。

美国总统拜登8月9日签署行政令，限制美国在所谓敏感高科技领域的部分对华投资，包括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特定人工智能系统。这项酝酿已久的对华投资限制令，让美国工商界忧心忡忡。

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发言人相继表示，对美方执意出台对华投资限制措施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强调“中方将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

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近日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投资限制令将对美国高科技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寻找机会造成负面影响，最后的结果极有可能为中国企业带来利好。

2021年6月9日，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台积电、中芯国际、紫光、新思、长电科技等300多家龙头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半导体行业“智慧芯”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

7月19日，南京，参展观众在2023世界半导体大会展台前拍摄半导体新品。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美国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实属罕见

“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实属罕见。”《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明年将正式实施的新行政令意味着美国的对华限制将不仅局限于商品，还扩展至资金流动。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新规，从2024年开始美国主体将被禁止投资于开发先进半导体和量子计算机的中国公司，在华经商的主体需要向美国政府通报对中国人工智能和其他类型半导体的直接投资。路透社称，该限制令不具回溯效力，仅针对未来投资。从目前到限制令生效期间进行的美国对华投资也不受其影响。值得关注的是，根据美国公布的行政令内容，新投资限制只适用于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合资企业和绿地投资等直接投资形式，不包括被动式的证券投资，也不涵盖生物技术行业。

拜登在8月9日签署的行政令中辩称出台新投资限制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因为美国的某些投资，可能有助于“那些开发敏感技术和产品以对抗美国及其盟国能力的国家的发展”。他称“有关国家”正在制定所谓全面的长期战略，“指导、促进或以其他方式支持敏感技术和产品的进步，这些技术和产品对相关国家军事、情报、监视或网络能力至关重要”。

拜登的辩词显示无法平息国内的相关争议。美国财政部前官员路德·维森向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表示，投资限制令是一个初步框架，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扩展，“虽然该行政命令最初仅限于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但它明确规定未来将扩大到其他领域。”

“这最终可能会伤害美国，因为会提高企业成本，并使美国与科技进步隔绝。”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丹兹曼对投资限制令忧心忡忡，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监管前所未有地扩大，由于一些技术性质很难界定，打压范围可能变得过于宽泛。

美国两党政策研究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米丽·本森预计，新的投资限制令将会禁止涉及军事客户和用途的人工智能领域投资，这样的范围太过宽泛，“政府有责任确定哪些人工智能投资属于军事类别，他们必须划定投资的界限。”

尽管新投资限制令何时会生效不得而知，但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在其最新文章中分析说，“该行政令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他分析说，如果投资限制令没有追溯适用，其效力只能覆盖美国在华投资总额——1.38万亿美元的不到1%。史剑道称：“行政令‘全面’实施的时间可能是在2024年大选前5个月，选举结束后，拜登第二届政府可能会简单地撤销行政命令。”

全球科技生态系统或走向割裂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新的投资限制令正式生效前，财政部还需要征求行业以及公众意见，但《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在新的资本管制新规出台前，“寒蝉效应”似乎已经到来，全球科技生态系统走向割裂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称，鉴于美国从“大量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在华商业活动中受益”，将密切关注拜登政府如何定义“涵盖国家安全的技术和产品”，担心这一单边政策使美企在面对外国竞争对手时处于不利地位。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表示，希望最终规则允许美国企业在公平环境中竞争，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市场。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超过10亿消费者，蕴含巨大消费潜力，已经成为众多跨国公司的主要市场。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此前，不少美企高管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投资限令表达担忧，认为限制美国资本流向中国可能会损害美国商业，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行业团体和风险投资家们正积极展开游说，反对美国广泛禁止对华投资，担心此举将搅乱商贸关系，最终损害美国经济。

美国特尼奥公司董事总经理加布里埃尔·维尔道发文称，考虑到新投资限制令的范围有限，其直接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法令中的“披露要求”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政客们越来越多地把企业对华投资视为与所谓‘外敌’勾结的一种形式，即便这种行为没有受到违法指控”。

限制中企资金来源的行动不会成功

美国政府不顾企业呼声，执意在投资领域大打“国家安全”牌，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称拜登政府试图切断中国初创企业资金来源的努力不会成功。

“拜登的‘行政限制令’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基本没有影响，甚至还有可能让中国高科技产业更安全。”项立刚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美国企业并不愿意切断与中国的联系。以半导体领域为例，诸如英伟达、高通等美国企业的收入非常依赖中国市场。

据美国彭博社公布的数据，高通向小米等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供应零部件，其中国市场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60%以上。英特尔将中国视为其最重要的销售市场，中国市场销售额占其销售总额的25%。而英伟达约20%的收入来自于中国。美国芯片行业的高管们担心，政府的限制令将削减销售额，导致他们用于研发的资金也相应减少。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近一年来，美国政府已向其盟友与伙伴透露这项投资限制令，希望盟友与美方“协调行动”，避免其他国家企业在美方投资撤出后在中国市场抢占美企份额，但美国的盟友并不愿配合。欧盟及其他国家均表示，严苛的限制可能损害经济。

中国海关总署官网7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前6个月中国大陆集成电路进口量降至2277亿块，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18.5%，同时芯片进口总额下降22.4%至1626亿美元。

“中国早就意识到发展高科技产业得靠自己。”项立刚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半导体、微电子、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这些敏感领域，牵涉重大安全问题，“不应该由外国资本投资和控制。”美方这一投资限制令或将让中方相关产业更加安全。

“尽管中方一再表示深切关注，但美方仍继续实施新的投资限制。中方对此非常失望。”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双向投资是双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美对华投资设限问题，中国商务部、外交部也第一时间表态。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打着“去风险”的幌子在投资领域搞“脱钩断链”，严重背离美方一贯提倡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决策，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的真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一己霸权私利，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

本报北京8月16日电

三十六名日本小学生『上书』质问首相岸田文雄

中青报·中青网驻日本记者 贾沂蒙

今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战败，无条件投降的78周年纪念日。与往年一样，日本政府仍在东京的日本武道馆召开“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对在二战中的死难者不做区分地加以追悼。尽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发言中表示“绝不会重蹈战争的覆辙”，但他今年的发言中仍旧没有明确提及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

更令人关注的是，8月15日，岸田文雄还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同一天，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等主要政党中共有67名国会议员先后前往靖国神社“拜鬼”，包括岸田内阁的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自民党政调会长萩生田光一、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其中，高市早苗是首位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的岸田内阁现任成员，她还以“国务大臣高市早苗”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香火钱。

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靖国神社，供奉着以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14名甲级战犯为首的上千名战犯的牌位。他们曾在朝鲜半岛、侵华战争中进行残忍杀戮，给包括亚洲人民在内的世界多国带来深重灾难。

据日本共同社8月14日报道，美国国家档案馆中一份历史档案显示，1948年东京审判之后，驻日本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所以决定将日本甲级战犯骨灰撒入大海，是因为“日本人有不做区别进行祭祀的倾向”。将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甲级战犯的骨灰秘密撒入大海，正是为了断绝这些二战战犯被“供”在墓地陵园“当成英雄和受难者受人瞻仰”的可能。

然而，近年来，日本右翼政客仍对着靖国神社的几位牌位大作文章。日本政要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此举也引发了日本国内与亚洲邻国对日本政府内外政策的强烈担忧。

日本《京都新闻》8月13日发表的一篇关于战败日的社论称：曾经承诺放弃战争的日本，正向“世界第三大军事大国”不断迈进。岸田政府此前提出2027财年日本国防开支将增至GDP2%的表态遭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在今年7月的一项调查中，约有60%日本受访者明确表示“不赞成”。

8月13日，日本《每日新闻》的一篇报道引发了日本社会强烈讨论。据报道，今年年初，东京都世田谷区和光小学的36名六年级学生将在学校社会科学习过程中的所思所感，写信寄到首相官邸，收件人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信中小学生们直率提出对日本政府安保政策的质疑。

关于日本增加防卫费，有小学生在信中写道：“因为朝鲜试射导弹就提高日本的防卫费，我认为是错误的。”也有小学生写道：“我认为将其他税费挪用到防卫费，这非常荒谬。”还有小学生质疑说：“为什么自卫队除了保卫国土以外，还要增加进攻选项？”

关于冲绳问题，和光小学的学生通过修学旅行实地探访，了解到2019年县民投票时，有70%的当地民众反对美军基地搬迁。对此，有小学生写道，“不能听取他人的意见就无法实现和平，因此政府也要聆听冲绳当地的意见。难道说有无法听取当地意见的理由吗？”

关于驻日美军基地存在的意义，小学生们也展开了热烈讨论，最终认为当地居民被卷入战争的风险更大。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称，尽管和光小学的学生年初就给首相官邸寄去了多封书信，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对此，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辩称：“实在难以一一回复，但政府会努力让国民理解国家的安保政策。”

本报东京8月16日电

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周谦接受中青报·中青网专访——

中格友谊在务实合作中迎来新发展

中青报·中青网驻南高加索记者 张 健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年来，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括格鲁吉亚。今年7月31日，中格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格鲁吉亚政府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揭开了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近日，中青报·中青网驻南高加索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周谦。

“中格建交31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500多倍，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让山海相隔的两国不再遥远。”周谦谈到，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新能源、金融等多领域开展合作，推动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

今年7月26日至8月1日，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来华出席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并访华期间，中格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格鲁吉亚政府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数字经济投资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文件，成功举办了中国-格鲁吉亚经贸论坛，探讨了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挖掘经贸合作潜力，做大互利共赢“蛋糕”。周谦表示，当前，格鲁吉亚与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正在共同打造的欧亚“中间走廊”是连接欧亚的最短路线，与中方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具有很大发展潜力。未来双方将在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品贸易、数字经济、旅游、投资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提升欧亚互联互通的多样性与安全性，搭建更多高质量平台，助力两国发展振兴。

自1992年建交以来，中格两国始终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发展道路，本着平等互利原则共同发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协调和配合，成为了相互信任的好朋友，真诚合作的好伙伴。此次，格鲁吉亚总理访华，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格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格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将就共同落实“三大倡议”同中方积极开展交流合作。

周谦认为，中格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格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相向而行的结果，标志着中格关系和政治互信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是中格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符合时代潮流和两国人民利益，对深化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将起到重要引领作用。

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也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

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合作一直是中格双边关系的一个亮点。2017年两国签署自贸协定，格鲁吉亚成为目前中国在欧亚地区唯一的自贸伙伴，双方贸易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已成为格鲁吉亚最大国别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贸易伙伴。

除经贸合作飞速发展，中格人文交流近年来也日益密切。周谦表示，格鲁吉亚现有两所孔子学院和一所孔子课堂，格民众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汉语教学发展蒸蒸日上。疫情形势变化后，中格人员往来已完全放开，仅最近几个月，已有雪地项目、柔道、击剑等多支中国体育代表队赴格参赛。此外，格鲁吉亚旅游业发达，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中国游客的欢迎，已成为中国游客出境游的新兴人气国家。

周谦说，中格人民虽山海相隔，但文化传统相近，友谊源远流长。中格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将为两国人文交流创造更多互动机会，两国教育、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大有可为。此次格鲁吉亚总理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在格鲁吉亚中小学开展中文教育的合作备忘录。今年9月中旬，中方还将在第比利斯举办中国电影周。未来双方将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新起点，持续深化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与认同，进一步夯实中格战略伙伴关系的民意基础。

周谦表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再次摆在人类面前。未来，中方将继续同格方深化各领域合作，以落实习近平主席“三大倡议”为引领，共同奏响和平、发展与文明互鉴的美好乐章。

本报巴库8月16日电

印度突然限制进口电脑 无理打击外企再添“一宗罪”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安琪

为了实现“印度制造”的夙愿，印度政府8月3日宣布将限制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个人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的进口，进口商需要申请许可证才能豁免，限制令立即生效。隔天，8月4日，印度又修改了立即生效的决定，将新限制推迟到11月1日起实施。

“印度突然决定限制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进口，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官僚主义的绝望，而不是一项深思熟虑的产业政策。”印度《商业标准报》评论称，莫迪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也只会让人更加觉得“印度政府是在胡搞”。

印度利用行政手段和市场壁垒强取豪夺的行为，在美国石英财经网（Quartz）记者安娜雅·巴塔查里亚看来，无疑是倒退回了“许可证统治”时代。在那个时代，没有政府的批准，任何商业决策都难以做出。不确定性是经济发展的敌人，不透明与印度政府想将国家转变为电子强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进口限制将导致印度国内市场混乱

有统计显示，印度国内笔记本电脑和个人电脑约有65%依赖进口，印度利用行政手段，妄图将“封杀”智能手机产业的既往“套路”复制到电脑产业，令各大电脑供应商一度陷入混乱。

美国彭博社报道称，突然出台的限制令整个行业措手不及。包括戴尔、苹果和三星在内的电脑供应商8月3日迅速采取行动，冻结了所有新的进口产品。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至6月，印度电子产品进口额为197亿美元，比2022年同期增长6.25%。印度政府数据显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个人电脑的进口额约占印度年度进口总额的1.5%。根据市场调查机构IDC公布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印度笔记本电脑市场份额排名前五分别是惠普、戴尔、联想、宏碁和华硕；平板电脑排名前五则是三星、苹果、联想、真我（Realme）和宏碁。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新限制将形成一种障碍，可能减缓进口流动。

有印度媒体指出，新限制会导致目前市场上笔记本电脑的供给减少，价格随之上扬。另有印度科技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称，从海外向印度进口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IT产品的公司将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申请进口许可证，这会导致国际电脑制造商推迟在印度发布新品，甚至导致产品短缺，而印度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海外发货。

现阶段印度没有能力实现“印度制造”

印度政府并没有就这一新举措直接说明原因，但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国务部长拉吉夫·钱德拉塞卡8月4日在一条“推文”中称，印度政府的目标是确保有值得信赖的硬件和系统，减少依赖进口，增加相关产品的国内制造。今年5月，莫迪政府曾公布一项为期6年、价值20亿美元的财政激励计划，以吸引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硬件制造商转移至该国生产。有美国媒体认为，印度本次出台的“限制令”是对今年5月计划的升级。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称，印度政府正寻求将自己定位为从电子产品的消费方改变为半导体等产品的高科技制造中心。然而，电脑本土化生产的道路困难重重。笔记本电脑等电子设备组件复杂，印度90%以上的电脑部件依靠进口。有分析认为，所谓“印度制造”中的“制造”更多指的是“组装”完全拆卸的组件，印度的重点只能是提高组装能力。加之印度自身没有尖端半导体工厂，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尖端的芯片工厂，只能继续进口高端芯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曾撰文指出，莫迪政府一方面希望借助外国资本和技术来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对于外国资本占领印度国内市场又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因而当在外国资本扶植之下的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以前不存在的市场被开拓出来之后，印度就会迫不及待地要据为己有。

长期不合理打击中资企业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有打压外资企业的恶习，大多采用非市场化的手段，胁迫外企帮助印度建立和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在2017年到2018年的两年间，印度手机整机进口关税税率由10%提升至15%，再到20%，为的就是打压外资品牌，扶持本土手机品牌。

2月1日，印度海得拉巴，一所公立高中的教师在使用笔记本电脑给学生讲课。这是当地政府推出的新项目，旨在通过普及笔记本电脑提高公立学校的教学效率。据统计，印度国内笔记本电脑和个人电脑约有65%依赖进口。

四川师范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朱明指出，印度长年对外国投资不友好，对外来公司高度警惕，因此印度长期以来营商环境非常差，对跨国企业也采取打压态势。

在印中国企业也是遭受印度政府无理打压的“受害者”。近些年，受中印两国关系波动影响，印度对中国企业进行了一系列围堵打击。据报道，印度已禁止至少300多款中国应用程序，并对中国企业和资金严加限制。印度还通过一系列手段对中国企业强取豪夺，变相收购在印中企。今年6月，印度《经济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印度政府官员近期与中国手机制造商举行会议，要求小米、OPPO、Realme及Vivo等必须为当地业务引入印度合作伙伴，同时任命印籍人士出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关键职务。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指出，印度销售的笔记本电脑中有80%从中国进口，平板电脑中也有约三分之二来自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副会长陈经表示，很明显印度想把在手机产业上的“经验”推广到电脑产业上，将产业链和供应链从中国等国转移出来。

有分析人士指出，印度方面可能认为，通过直接掠夺在印企业，抢夺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实现“印度制造”的最便捷途径。印度的意图非常明确，妄图借助美国所谓“印太战略”，与美西方勾连，在遏制中国的同时，推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转移，谋求印度国内的经济发展。

面对印度政府对中国企业的长期无理打压行为，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多次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印度方面为在印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商业环境，中方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合法合规经营，同时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